

## 清初御定經解的經典化與學術取向\*

張宗友\*\*

### <目次>

- |                              |                           |
|------------------------------|---------------------------|
| I. 引言                        | IV. 闡發義理，裨益政治：御定經解之使命與經典化 |
| II. 清初御定經解之編纂概況              | V. 清初御定經解之學術影響            |
| III. 尊奉程朱，經筵日講：清初編纂御定經解之歷史背景 |                           |

### I. 引言

古代中國，每當易代之際，中央集權的大一統王朝在建立之後，通常組織編纂大型文獻，以籠絡各層儒家知識分子，使天下思想趨于一統，既鞏固了自身統治，也往往影響甚至決定了學術文化發展的取向與進程。歷史上，儒家思想占據主流意識形態的地位，儒家所信奉的包孕有聖人微言大義的幾部經典，也備受中央王朝關注，唐初修《五經正義》，明修《五經》《四書》大全，堪稱其中顯例。明清易代之後，以儒家經典為核心，產生了一大批經學著作，晚明以降沉悶踏虛的學術氛圍為之一新。除學者個人的考證、闡釋之作外，還出現了具有集大成性質的經解叢書(徐乾學、納蘭性德《通志堂經解》)、經學總目(朱彝尊《經義考》)等，呈現出博大的氣象。而以皇帝名義編纂的御定經解，亦蔚成系列(如“日講”系列與“彙纂”系列)，與前述幾類經學著作鼎足並立，堪稱此期學術史、政治史上的突出景觀。較諸唐修《正

\* 이 논문은 2012년 동국대 교내 연구비 지원에 의해 이루어졌음.

\*\* 동국대학교 중어중문과 부교수

義》、明修《大全》，清初御定經解不僅在產生方式上有所不同，它所擔負的政治、文化使命也存在差異，又因為時勢轉移而產生出與其他經解著作迥然相別的歷史際遇，深刻影響了傳世經典的研究與傳承。考察御定經解編撰的歷史面貌與社會背景，尋繹其經典化表象下的學術脈絡及深層動因，探究其對後世尤其是乾嘉學風的深遠影響，乃是極具價值的學術論題。

## II. 清初御定經解之編纂概況

本文所說的“清初”，指滿清取得中央政權之後的順治、康熙、雍正三朝，而以康熙朝為主。在這一歷史時期，滿清貴族軍事集團建立起中央集權的大一統王朝，其統治漸趨穩固，于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層面，均呈現出盛世氣象。“御定經解”，即由作為封建皇權最高獨裁者的皇帝，下令編撰的闡釋儒家經典的解經著作。雖然各種著作所藉名義有所不同，如“欽定”、“敕撰”、“御製”、“御纂”等，且清初諸帝參與程度也有所區別，但出于皇帝之命，成于儒臣之手，則毫無二致。茲為論述方便，統稱以“御定經解”。

清初御定經解的編纂，創始于順治，大成于康熙，續纂于雍正，而畢工于乾隆。

順治朝共有兩部經解得以完成。最早的一部是《御定孝經注》，修成于順治十三年(1656)。四庫館臣于書前提要中稱：“《孝經注》一卷，順治十三年大學士蔣赫德恭纂，仰邀欽定御製序文冠首。”可知此書雖名“御定”，實由大學士蔣赫德等儒臣纂就。第二部經解是《易經通注》九卷，由大學士傅以漸、日講官曹本榮等負責編纂，成書較速，順治十五年冬十月即表進之。順治還着手進行《孝經》的集解工作，而未竟其業<sup>1)</sup>。

清初御定經解，就其編纂宗旨、規模而言，主要確立、完備于康熙朝。

1) 此外，與政治教化密切相關、屬于子部儒家類的書籍，在順治朝也完成了三部，分別是《勸善要言》一卷、《御定資政要覽》三卷(另《後序》一卷)、《御定內則衍義》十六卷。

康熙雄才大略，藉經筵日講的途徑，有步驟地學習漢文化，研讀儒家經典，并下令儒臣，將君臣講習的結果編撰成書，從而有了“日講”系列經解的問世；復又彙集前儒經說，又有“彙纂”(即“集解”)等系列經解的問世。

“日講”系列經解，主要有以下五種：《日講四書解義》二十六卷，成書于康熙十六年(1677)；《日講書經解義》十三卷，問世于康熙十九年；《日講易經解義》十八卷，康熙二十三年編訖；《日講禮記解義》六十四卷，創始于康熙，告成于乾隆；《日講春秋解義》六十四卷(另有《總說》一卷)，亦創始于康熙而卒業于乾隆。按照傳統經典的序列，該系列應當還有《日講詩經解義》一種，而未見行世。康熙已為此書撰寫序文(載于《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二集》卷三十一)，足證當時已有編撰規劃。

“彙纂”系列經解，以“彙纂”二字標題的有以下三種：《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三十八卷、《欽定詩經傳說彙纂》二十一卷、《欽定書經傳說彙纂》二十四卷(後兩種成書于雍正朝)。該系列中無《欽定易經傳說彙纂》一種，或因《御纂周易折中》二十二卷足以當之，如雍正即將其與《春秋》《詩經》兩種相提並論：“我皇考聖祖仁皇帝右文稽古，表章聖經，《御纂周易折中》既一以《本義》為正，於《春秋》《詩經》，復命儒臣次第纂輯，皆以朱子之說為宗。”<sup>2)</sup>至于禮，乾隆時命儒臣纂修《三禮義疏》，兼有補足之意。

除《御纂周易折中》外，康熙朝還編纂了屬於樂類的《御製律呂正義》五卷。順治時即已着手編纂的《御定孝經衍義》一百卷，也完成于此時。此外，小學為通經之途，康熙時完成的《御定康熙字典》三十六卷，也具有集成性質<sup>3)</sup>。出于尊崇程朱理學的需要，康熙還下令編纂了《御纂朱子全書》六十六卷、《御纂性理精義》十二卷，這兩種屬於傳統文獻分類上的子部儒家類。

2) 雍正《世宗憲皇帝御製詩經傳說彙纂序》，載《欽定詩經傳說彙纂》卷首，《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永裕、紀昀等纂修，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第83冊，1頁。

3) 參康熙五十五年閏三月十九日《御製康熙字典序》，載《御定康熙字典》卷首，《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229冊，2頁。

綜上可知，正是在康熙的醉心研習與大力推動之下，清廷大體上完成了《五經》、《四書》的新注工作，尤以脫胎于經筵日講的“日講”系列與匯集前儒解說的“彙纂”(即“集解”)系列影響最大。

上述御定經解與相關著述之編撰情況，略見下表：

序次	書名	帝王	儒臣	編纂時間	部類	備注
1	《御定孝經注》一卷	順治	蔣赫德	1646	孝經類	順治序
2	《勸善要言》一卷	順治		1655	儒家類	順治序
3	《御定資政要覽》三卷 《後序》一卷	順治	呂宮	1655	儒家類	順治序
4	《御定內則衍義》十六卷	順治	傅以漸	1656	儒家類	順治序
5	《御定孝經衍義》一百卷	順治 康熙	葉方藹、張英、 韓菼	1656~ 1682	儒家類	康熙序， 進表
6	《易經通注》九卷	順治	傅以漸、曹本榮	1656~ 1658	易類	飭命，進 表，傅序
7	《日講四書解義》二十六卷	康熙	喇沙里、陳廷敬	1677	四書類	康熙序， 進呈疏
8	《日講書經解義》十三卷	康熙	庫勒納、葉方藹	1680成	書類	康熙序
9	《日講易經解義》十八卷	康熙	牛鈕、孫大豐	1684成	易類	康熙序， 進呈疏
10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三十八卷	康熙	王掾、張廷玉	1699~ 1721	春秋類	康熙序
11	《御定康熙字典》三十六卷	康熙	張玉書、陳廷敬	1710~ 1716	小學類	康熙上諭 、序
12	《御製律呂正義》五卷	康熙		1713	樂類	《御製律 曆淵源》 之一
13	《御纂周易折中》二十二卷	康熙	李光地	1713~ 1715	易類	康熙序
14	《御纂朱子全書》六十六卷	康熙	李光地、熊賜履	1714	儒家類	康熙序， 進表

15	《御纂性理精義》十二卷	康熙	李光地	1717	儒家類	康熙序, 進表
16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二十一卷	康熙 雍正	王項齡	1727成	詩類	雍正序
17	《日講春秋解義》六十四卷, 《總說》一卷	康熙 雍正 乾隆	允禮、張廷玉、 方苞	1729 再校, 1737 刊成	春秋類	康熙序, 乾隆序
18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二十四卷	康熙 雍正	王項齡	1730成	書類	雍正序
19	《日講禮記解義》六十四卷	康熙 乾隆	張廷玉、鄂爾 泰、汪由敦	1747成	禮類	康熙序, 乾隆序

如果把清初御定經解, 與唐修《正義》、明修《大全》相較, 那么, 清初御定經解的時代特色是顯而易見的。雖然同出帝王之命, 而《正義》與《大全》均全出儒臣之手, 帝王鮮能參與其事。清初御定經解(尤其是“日講”系列), 則以經筵日講的講章與研討心得為基礎, 康熙親與其事, 直接決定了這批經解的理論基調與纂修進程。

### III. 尊奉程朱, 經筵日講: 清初編纂御定經解之歷史背景

如上表所示, 清初御定經解, 並非成于一時, 雖發端于順治, 而大成于康熙, 全部完成則到了雍正、乾隆時期。徵諸歷史, 可知這批經解的編纂, 是在明清易代之後, 清廷逐漸接受漢文化、尊崇程朱理學的宏大歷史背景下進行的, 與清初政局的演進歷程, 密切相關。

#### 1. 清初編纂御定經解之歷史背景

滿清入關之前, 實行軍政合一的八旗制度, 雖僻處關外, 人口較少, 而

極具戰力，成爲與明王朝、李自成、張獻忠相並峙的四大軍事集團之一。順治元年(1644年，當崇禎十七年)，李自成攻入北京，覆亡明朝。清兵入關，打敗了李自成、張獻忠及明朝殘餘力量，在軍事上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爲中央集權的統一王朝奠定了基礎。滿清上層深知，巧取中原，可以憑藉軍事手段，藉勢而爲；而治理天下，則遠非軍事一途可恃，必須“興文教，崇經術”<sup>4)</sup>，建立起與中央集權的統一王朝相適應的政治制度與文化方略。滿清在崛起過程中，即不斷地吸納漢族知識分子(如范文程、洪承疇等)，參贊機務；定鼎中原以後，更積極採取虛心學習漢文化的統治策略。在政治制度上，清廷基本上因襲明朝，而以滿人爲主導；在思想文化上，則接受漢文化，尊奉程朱理學，作爲新王朝籠絡人心、統一天下思想的工具。于是開科取士，作育人才；尊孔祭孔<sup>5)</sup>，追封並優禮聖賢後人<sup>6)</sup>，以示褒崇。種種措施，不一而足。舉行經筵日講，由皇帝與儒臣共同研習儒家經典，則爲重中之重，從國家典禮、帝王教育的層面，體現了清廷對漢文化與程朱理學的全面禮敬與接受，起到了垂則天下的示範作用<sup>7)</sup>。經筵日講的舉行，不僅使清廷上層接受了漢文化，養成研習儒家經典的社會風尚，還直接促成了御定經解在康熙朝有系統地編纂。

- 
- 4) 順治十二年(1655)三月壬子，諭禮部：“朕惟帝王敷治，文教是先；臣子致君，經術爲本。自明季擾亂，日尋干戈，學問之道，闕焉未講。今天下漸定，朕將興文教，崇經術，以開太平。”《世祖實錄》卷九十，巴泰、圖海等纂修，載《清實錄》第3冊，中華書局1985年版，712頁。
- 5) 康熙二十三年十一月己卯，康熙南巡，親至曲阜祭孔。參《聖祖實錄》卷一一七，馬齊、張廷玉等纂修，《清實錄》第5冊，231-232頁。
- 6) 順治元年(1644)十月丙辰，封孔、顏、曾、孟四氏後襲五經博士，“至尼山書院、洙泗書院及四氏學錄等官，俱照舊留用。管勾、司樂、掌書等缺，聽衍聖公咨部補授。”(《世祖實錄》卷九，《清實錄》第3冊，92-93頁。)順治九年九月癸巳，復予賞賜、慰勉。《世祖實錄》卷六十八，《清實錄》第3冊，539-540頁。
- 7) 經筵日講，原係古代中國帝王教育的一種儀制與方式，是帝王學習儒家經典、進德修業的主要途徑。就清代而言，“經筵”是定期舉行的國家典禮，一般于仲春、仲秋舉行；“日講”則具有常課性質，儒臣事前撰好講章，需要時可以擇期進講。

## 2. 順治朝經筵日講之舉行

清代經筵日講，始於順治朝。清廷入主北京不久，天下尚未安定，已有儒臣上疏，請開經筵日講<sup>8)</sup>。經筵遲遲未開，與政局有關。朝廷大權掌握在攝政王多爾袞(1612~1650)手中，儒臣的建議雖能得到順治的認同，但並未付諸實施。多爾袞卒後，順治親政，三年之間，儒臣章凡數上，其中以編修曹本榮之疏最要：

皇上親政以來，良法美意，漸見施行。而猶水旱洊臻，星辰失次，何歟？誠以聖學未講，而紀綱未張也。何謂聖學？皇上得二帝三王之統，當以二帝三王之學為學。凡《四書》《六經》及《通鑑》中有裨身心要務、治平大道者，內則朝夕討論，外則經筵進講。君德既成，天命自相與流通矣。<sup>9)</sup>

大理寺少卿霍達之奏，亦頗中肯綮：

帝王之治天下，惟在正心之道，端在勉學。然非取典謨經籍講求而力行之，無以追蹤二帝三王之盛業也。皇上春秋鼎盛，正當及時力學，則日講之官，不可不專設；日講之事，不可不急行。<sup>10)</sup>

合曹、霍二疏以觀，儒臣已把經筵日講提高到講求聖學、養成君德、繼承治統、踐履天命的政治高度，這也正是儒臣希望通過經筵日講能達到的終極功能。

順治十二年(1655)夏四月癸亥，“以學士麻勒吉、胡兆龍、李霽、侍讀學士折庫納、洗馬王熙、左中允方懸成、右中允曹本榮、俱充日講官。擇於本月二十五日開講。”<sup>11)</sup>日講雖已開始，而經筵典禮的舉行，已是兩年之後的九月<sup>12)</sup>。據統計，順治朝共舉行六次經筵典禮<sup>13)</sup>。

8) 順治元年(1644)十月丙辰，戶科給事中郝傑上書，請擇端雅儒臣，日譚進《大學衍義》及《尚書》典謨數條，獲順治首肯。參《世祖實錄》卷九，93頁。

9) 《世祖實錄》卷六十九，順治九年(1652)十月庚申條，546頁。

10) 《世祖實錄》卷八十八，順治十二年(1655)正月壬子條，698-699頁。

11) 《世祖實錄》卷九十一，714頁。

12) 《世祖實錄》卷一一一，順治十四年九月丙午條，872頁。

13) 《清代經筵制度研究》，陳東撰，山東大學2006年度博士論文，16頁。

順治朝經筵日講舉行較晚，前期固然出于多爾袞之掣肘，順治本人並不十分熱心也是重要原因。滿清上層對學習儒家經典、吸收漢文化，還懷有一定程度的疑慮，保持了某種疏離感。終順治一朝，御定經解僅有兩種，對程朱理學的尊奉，也主要不是通過經筵日講的途徑表現出來。

順治〈御製孝經序〉云：

朕惟孝者，首百行而為五倫之本，天地所以成化，聖人所以立教，通之乎萬世而無斁，放之於四海而皆準，至矣哉，誠無以加矣。……誠萬世不刊之懿矩，百聖不易之格言，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不可一日闕者。<sup>14)</sup>

順治對《孝經》“移風易俗”的認識，並未超越前儒，雖有化成四方之意，但尚未上升到治國方略的高度。順治十四年(1657)二月，諭大學士傅以漸、日講官曹本榮：

朕覽《易經》一書，義精而用博，範圍天地萬物之理。自魏王弼、唐孔穎達有注釋、正義，宋程頤有傳，迨朱熹《本義》出，而後之學者宗之。明永樂間，命儒臣集元代以前諸儒之說匯為《大全》，皆于《易》理多所發明。但其中同異互存，尚有繁而可刪、華而寡要之處。迄今幾三百年，儒生、學士發揮經義者，亦不乏人。當並加采擇、折衷諸論，簡切洞達、輯成一編，昭示來茲。爾等殫心研究、融會貫通。其必析理精深，敷詞顯易，約而能該，詳而不復，使義經奧旨，炳若日星，以稱朕闡明四聖人作述之至意。<sup>15)</sup>

順治注意于采擇、折衷前儒諸論，目的在發揮聖人作述之意，雖然身份特殊，但其識見與一般注《易》儒者，並無不同。順治並未將本朝所撰經解拔高為王朝經典，這與他對儒家經典的認識水平是相吻合的。

14) 載《御定孝經注》卷首，末署“順治丙辰仲春望日序”。《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82冊，255—256頁。

15) 《世祖實錄》卷一〇七，《清實錄》第3冊，中華書局1985年版，834—835頁。按：《易經通注》卷首載順治飭命一道，署“順治十三年(1646)十二月十五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37冊，1頁）。傅以漸在《易經通注序》中，稱其時為“歲在丙申嘉平之望”（同前，4頁）。四庫館臣在該書提要中亦承此說（《四庫全書總目》卷六）。

## 3. 康熙朝經筵日講與御定經解之編撰

康熙朝經筵日講，直接決定了御定經解之編撰。康熙即位不久，即有儒臣上書，要求及時舉行經筵。具有代表性的是康熙七年(1668)九月癸丑，內秘書院侍讀學士熊賜履的上書。熊氏以“朝政積習未祛，國計隱憂可慮”，引宋儒程頤“天下治亂繫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之語，認為“講學勤政，二者不可偏廢。而在今日，尤為最切要者也”。康熙責其不能實在指陳，屬“冒奏”沽名，竟下部議處<sup>16)</sup>。次年四月辛巳，兵科給事中劉如漢疏言：

帝王首務，莫大於視學，莫急於經筵。伏考世祖章皇帝親政之初，躬幸太學，肇舉經筵，煌煌盛典，載在史冊。我皇上睿知聰明，善繼善述，無事不以世祖章皇帝為法。經筵日講，已屢奉諭旨，仰見我皇上尊經重道之至意。請敕禮部，詳考舊章，先行日講，次舉經筵。選擇儒臣，分班進講。<sup>17)</sup>

此議遠較熊賜履所論平和，康熙“嘉其言，下部議行”。<sup>18)</sup>

康熙作為一代雄主，宏圖大略，好學深思，對漢文化及儒家經典極為推崇。同乃父相似，亦以幼齡登極，早期朝政，實把持在輔政大臣鰲拜手中。內憂未除，雖有壯志，竟不能行。康熙八年(1669)五月，鏟除鰲拜；次年十月丁酉，即諭禮部：“帝王圖治，必稽古典學，以資啟沃之益。經筵日講，允屬大典，宜即舉行。爾部詳察典例，擇吉具儀奏聞。”<sup>19)</sup>次月丙辰，禮部遵旨議覆：“經筵應照順治十四年例，每年春秋二次舉行。擇于明年二月十七日午時開講。前期皇上親祭奉先殿，及先師孔子。講官聽內閣酌定員數題用。經書講章，應令講官撰送，內閣酌量改定，預期恭進御覽。禮儀筵宴，俱照舊例。其日講日期，擇于本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巳時開講。日講官亦俟內閣酌定題用。”<sup>20)</sup>次年(1671)二月己亥，首次舉行經筵典禮，並於前一日遣大學士杜

16) 《聖祖實錄》卷二十七，《清實錄》第4冊，373-374頁。

17) 《聖祖實錄》卷二十八，《清實錄》第4冊，393-394頁。

18) 《聖祖實錄》卷二十八，《清實錄》第4冊，394頁。

19) 《聖祖實錄》卷三十四，《清實錄》第4冊，462頁。

20) 《聖祖實錄》卷三十四，《清實錄》第4冊，462-463頁。

立德，告祭先師孔子<sup>21)</sup>。根據《聖祖實錄》之記載，康熙朝舉行經筵典禮達六十次之多<sup>22)</sup>。

與順治朝相較，康熙朝經筵日講有以下幾個方面較為突出：

(1) 按期舉行，成爲定制。

康熙朝經筵典禮，一般于春季二月、秋季八月舉行，形成定例(在外巡行除外)。康熙二十二年(1683)八月辛丑，諭經筵講官等：“經筵關係大典。自大學士以下，九卿詹事科道俱侍班。所講之書，必君臣交儆，上下相成，方有裨于治理。向來進講，俱切君身。此後當兼寓訓勉臣下之意，庶使諸臣，皆有所警省。”<sup>23)</sup>經筵前一日，例應祭先聖先師於傳心殿，或親詣，或遣官恭代。康熙二十五年二月己酉，太常寺以文華殿告成請旨。諭：“經筵大典，于文華殿初次舉行。先聖先師，道法相傳。昭垂統緒，炳若日星。朕遠承心學，稽古敏求。效法不已，漸近自然。然後施之政教，庶不與聖賢相悖。其躬詣行禮，以彰景仰之意。”<sup>24)</sup>

(2) 慎擇講官，褒崇優待。

對經筵講官，康熙選擇尤慎。康熙十年二月，首批講官是“吏部尚書黃機，刑部尚書馮溥，工部尚書王熙，都察院左都御史明珠，禮部左侍郎常鼐，戶部右侍郎田逢吉，刑部右侍郎多諾，中和殿學士折爾肯，保和殿學士達都，翰林院掌院學士折庫納、熊賜履，侍讀學士傅達禮、史大成，侍講學士胡密色、李仙根，國子監祭酒徐元文”<sup>25)</sup>，俱爲一時滿漢儒臣之選。是年八月，設立起居注官，由日講官兼攝，並“添設漢日講官二員，滿漢字主事二員，滿字主事一員，漢軍主事一員”<sup>26)</sup>。此後根據進講需要，隨時添設日講官

21) 《聖祖實錄》卷三十五，《清實錄》第4冊，474頁。

22) 《清代經筵制度研究》，16頁。

23) 《聖祖實錄》卷一一一，《清實錄》第5冊，136頁。

24) 《聖祖實錄》卷一二四，《清實錄》第5冊，321頁。

25) 《聖祖實錄》卷三十五，《清實錄》第4冊，473頁。

員。例如康熙二十年(1681)正月辛巳，諭翰林院：“日講官敷陳經史，日侍顧問。贊襄典學，職務繁多。宜廣其員，以彰右文之治。”<sup>27)</sup>是年二月甲午，一次就增加了八員日講起居注官，分別是翰林院侍讀學士孫在豐、侍講湯斌、檢討秦松齡、編修曹禾、檢討朱彝尊、嚴繩孫、左春坊左贊善徐乾學、編修王頊齡、檢討潘耒<sup>28)</sup>。其中朱彝尊等六人為應徵中選的博學鴻儒，俱當代名士，益見康熙籠絡鴻儒的治世用意及虛心向學的風範。

康熙對講官頗為優待。表現為：①賜宴。經筵典禮之後，即賜大學士、九卿、詹事及講官等宴，成為定例。②賜物。如康熙十九年(1680)六月甲申，“以御書卷軸，賜學士庫勒納、葉方藹，詹事格爾古德、沈荃，侍讀學士牛紐、常書、崔蔚林、蔣弘道，侍講學士張玉書、嚴我斯，侍講董訥、王鴻緒各一。”<sup>29)</sup>③賜金。如康熙二十三年九月庚午，以講官湯斌“久侍講筵，老成端謹”，特簡用為江蘇巡撫，賜白金五百兩，表裏十端<sup>30)</sup>。④晉秩。如康熙十九年五月壬辰，議敘日講官起居注官，分別給予加銜、增俸、晉級之獎勵<sup>31)</sup>。

由于日講官侍奉在側，係文學親近之臣，康熙便藉機觀察其品行、能力，以選拔人才<sup>32)</sup>。

### (3) 勤奮學習，務求明徹。

在舉行經筵日講的過程中，康熙表現出了極大的學習熱情，可用“迫不及待”、“如饑似渴”二語形容之。他要求講官改變隔日進講的慣例，每天進

26) 《聖祖實錄》卷三十六，《清實錄》第4冊，489頁。

27) 《聖祖實錄》卷九十四，《清實錄》第4冊，1187頁。

28) 《聖祖實錄》卷九十四，《清實錄》第4冊，1190頁。

29) 《聖祖實錄》卷九十，《清實錄》第4冊，1143頁。

30) 《聖祖實錄》卷一百一十六，《清實錄》第5冊，214頁。

31) 《聖祖實錄》卷九十，《清實錄》第4冊，1134頁。

32) 康熙三十三年(1694)五月甲辰，諭禮部尚書兼管翰林院掌院學士事張英曰：“翰林係文學親近之臣，向因日講，時時進見，可以察其言語舉止。”《聖祖實錄》卷一六三，《清實錄》第5冊，782頁。

講<sup>33</sup>)，即使有軍機要務<sup>34</sup>)，也不能影響進程。康熙極為勤政，未明即起，也要求講官待漏宮門，進講于部院未奏事前<sup>35</sup>)。他打破講官在講筵行禮後才進講的舊例，要求把講章直接齎至內廷進講<sup>36</sup>)。康熙學習進度很快，講官甚至來不及編寫講章<sup>37</sup>)。

在研習方式上，康熙要求于講官進講後，自己再進行“覆講”<sup>38</sup>)，有時還先于講官試講：

辰時，上御弘德殿，講官喇沙里、陳廷敬、葉方藹進講“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四節。方展書，上諭曰：“朕先講一次，然後進講。”講官拱立聽講。<sup>39</sup>)

33) 康熙十三年(1674)九月壬戌朔，“翰林院諸臣，以幾務殷繁，請間日一進講。上曰：‘軍機事情，有間數日一至者，亦有數日連至者，非可限以日期。其仍每日進講，以慰朕倦倦向學之意。’”《聖祖實錄》卷四十九，《清實錄》第4冊，644頁。

34) 康熙十三年(1674)九月壬戌朔，諭翰林院掌院學士傅達禮等曰：“日月易邁，雖當此多事之時，不妨乘間進講，於事無誤，工夫不間，裨益身心非淺。”《聖祖實錄》卷四十九，《清實錄》第4冊，644頁。

35) 康熙二十二年(1683)八月庚子朔，“諭講官：‘朕每旦，未明求衣，坐待部院奏事。奏事既畢，然後入講。不惟遲延晷刻，亦且稽誤工夫。自後於未啟奏前進講，方得從容議論，多所發明。’自是講官，待漏宮門。甫辨色，上已御講筵矣。”《聖祖實錄》卷一一一，《清實錄》第5冊，136頁。

36) 康熙二十五年(1686)閏四月己未，“上諭翰林院掌院學士庫勒納、張英等曰：‘爾等每日將講章捧至乾清門豫備，詣講筵行禮進講，為時良久，妨朕披覽功，著暫停止。《春秋》、《禮記》，朕在內每日講閱。其《詩經》、《通鑒》講章，俱交與張英，令其齎至內廷。’”《聖祖實錄》卷一二六，《清實錄》第5冊，336頁。

37) 康熙二十四年(1685)四月丁未，“翰林院奏：‘皇上聰明天縱，好學敏求，洵從古所未有。臣等會同詹事等官，正在晝夜撰擬日講講章。伏乞皇上少緩進講，俾得陸續撰擬進呈。’得旨：‘仍著按日進講。其講章，爾等撰擬後，節次進呈。’”《聖祖實錄》卷一二〇，《清實錄》第5冊，264頁。

38) 康熙十四年(1675)四月辛亥，“諭起居注官學士傅達禮、侍讀學士喇沙里曰：‘日講原期有益身心，增長學問，今止講官進講，朕不覆講，但循舊例，日久將成故事，不惟於學問之道無益，亦非所以為法於後世也。嗣後進講時，講官講畢，朕仍覆講。如此互相討論，庶幾有裨實學。’”《聖祖實錄》卷五十四，《清實錄》第4冊，702頁。

39) 《康熙起居注》“十六年四月十四日庚申”條，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整理，中華書局1984年版，302頁。

有時講畢，康熙還要反復琢磨經典大義，務求道理明徹<sup>40</sup>。以下這條材料，頗能見出康熙對講筵的理解與日常情形：

(康熙五十年二月)辛巳。上御經筵。諭大學士等曰：“從來經筵之設，皆帝王留心學問、勤求治理之意。但當期有實益，不可止飾虛文。朕觀前代講筵，人主惟端拱而聽，默無一言。如此，則雖人主不諳文義，臣下亦無由而知之。若明萬曆、天啟之時，何嘗不舉行經筵？特存其名耳，何裨實用。朕御極五十年，聽政之暇，勤覽書籍，凡《四書》《五經》、《通鑒》、《性理》等書，俱經研究，每儒臣逐日進講，朕輒先為講解一過。遇有一句可疑、一字未協之處，亦即與諸臣反覆討論，期於義理貫通而後已。蓋經筵本係大典，舉行之時，不可以具文視也。”上親講《四書》“忠恕違道不遠”一節、《易經》“九五飛龍在天”一節。講畢，賜大學士、九卿、詹事、及講官等宴。<sup>41</sup>

康熙通常要求逐日進講，而且要親自“覆講”，與儒臣往復質辨大義，可謂深得“日講”本義。後來編撰成書的御定經解，雖以講官講章為藍本，亦包涵君臣共同研討的內容，蘊有康熙本人見解在內。御定經解(尤其是“日講”系列)，因此可視為康熙與日講諸臣共同完成的解經之作。

康熙通過舉行經筵日講，不僅完成了儒家經典的啟蒙教育，下令編撰了“日講”系列及後續的“彙纂”系列經解，而且從鞏固統治出發，把尊崇程朱理學作為文化方略，進而提昇御定經解的學術與政治地位，欲將其形塑為王朝新經典，並為此做好了充分的理論準備。

順治、康熙二帝，俱為幼年登極，同受滿、漢文化的雙重教育。他們對儒家經典的不同體認，與各自所處的時代條件、需要應對的政治局面密切相關。順治即位時，滿洲權貴軍事集團剛剛奪得政權，天下未定，如何平定各

40) 康熙十二年(1673)三月，諭學士傅達禮：“學問之道，在於實心研索，使視為故事，講畢即置之度外，是務虛名，于身心何益？朕于諸臣進講後，每再三紬繹，即心有所得，尤必考正於人，務求道理明徹乃止。”《聖祖實錄》卷四十一，《清實錄》第4冊，551頁。

41) 《聖祖實錄》卷二四五，《清實錄》第6冊，432頁。

地異己軍事力量，是摆在面前的急務。康熙登極時，天下初定，面對以漢族為主的地理與文化環境，需要解決的是如何穩定局面、鞏固統治。順治之于儒學，被動接受的成分較多，而且其興趣主要在佛學，出世之意較濃。康熙本人，好學多能，勤于政事，對儒家經典尤為熱衷，用世之意頗深。康熙把接受漢文化、學習傳統經典、尊奉程朱理學視為朝廷方略，雖有個人愛好成分，更多的則是出于籠絡天下士子、鞏固中央政權的考量<sup>42)</sup>。無論從御定經解的數量，還是對傳統經典的認識上來看，康熙都堪稱清初編纂御定經解的核心人物。有清一代之御定經解，實奠基並大成于康熙朝。

#### IV. 闡發義理，裨益政治：御定經解之使命與經典化

古代中國，儒家思想居于主流地位。儒家尊奉的《五經》，自漢以降，即被中央王朝奉為經典，穩居于古代文獻體系之核心。唐初，孔穎達等修《五經正義》，集兩漢以降諸儒解經之大成，成為新的官修經典。《四書》經朱子表彰，在明初與《五經》一起，同與《大全》之修，又成就了明朝官學之經典。可見歷次經典之生成，必以《五經》為核心，以闡釋聖人微言大義為職志，且以前修經典為基礎，參以前儒經解或新說，然後加以裁斷；既與前修經典立異，又能適應當代政治與學術之需求。傳統中國的主流思想與學術，正是遵循這一演進模式，不斷地賦舊典以新義，經久彌新，傳承不絕。

滿清定鼎中原，除軍事外，大都因襲明制，但是注意保留關外特色，從而對前明體制保持了一定的距離。例如在政治制度上，雖承襲明制，而以滿族官員為主導。在思想文化上，雖不得不全面接受漢文化，尊崇程朱理學，而為與前明相別，又需要尋找新的理論與文獻工具。通過經筵日講，清廷不

42) 康熙〈御製朱子全書序〉：“朕一生所學者，為治天下，非書生坐觀立論之易。”載《御纂朱子全書》卷首，末署“康熙五十二年癸巳夏六月”。《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720冊，2頁。

僅在國家禮制與帝王教育層面體現了對漢文化的禮敬與尊崇，而且以帝王之尊，研習、精熟傳統經典，以得聖賢之心法自許，足闡微言大義，儼然以道統傳人自居<sup>43</sup>。如此，帝王通過學統，集道統與治統于一身，這一轉換，堪稱完美。康熙正是循着這一理路，通過經筵日講的途徑，醉心于研習儒家經典、學習漢文化，並通過編纂御定經解的方式，將君臣講習的結果以御定經解的形式呈現出來。御定經解實以演繹程朱理學為理論基點，以儒臣經筵講義為基礎，注入康熙之治學心得，從而與前明經典(《大全》)相異，為本朝的理論建構作了文獻上的準備。在康熙、雍正、乾隆三位君主的政治推動下，作為清廷欽定的解經標準，這批御定經解逐漸成為新的王朝經典，不僅天下士子，嚮風而習，而且還影響了乾隆以降的治學理念與取向。

### 1. 康熙對御定經解的功能建構與頒行

如上所述，通過經筵日講，康熙在儒臣講求聖學、養成君德、繼承治統、踐履天命的定位中，不僅接受了對儒家經典的啟蒙，還下令編撰了“日講”系列等經解。康熙本人又是一代雄主，博學多能，在統馭紛繁複雜的政局、尋找鞏固統治的文化方略過程中，展示了極強的理論建構能力。他從帝王治理天下的角度，來審視、研讀經典，並賦予御定經解以接續道統的重要使命，使其成為新王朝的載道之具。康熙在數篇御製序文，曾反復申述，其中以〈御製日講四書解義序〉(康熙十六年(1677)十二月)較為完備，也最具代表性。序云：

朕惟天生聖賢，作君作師。萬世道統之傳，即萬世治統之所繫也。自堯、舜、禹、湯、文、武之後，而有孔子、曾子、子思、孟子。自《易》《書》《詩》《禮》《春秋》而外，而有《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之書，如日月之光昭於天，嶽瀆之流峙於地，猗歟盛哉！蓋有四子而後，二

43) 如前揭康熙二十五年二月己酉諭：“先聖先師，道法相傳。昭垂統緒，炳若日星。朕遠承心學，稽古敏求。效法不已，漸近自然。然後施之政教，庶不與聖賢相悖。”《聖祖實錄》卷一二四，《清實錄》第5冊，321頁。

帝三王之道傳；有四子之書，而後《五經》之道備。四子之書，得《五經》之精意而為言者也。孔子以生民未有之聖，與列國君大夫及門弟子論政與學，天德王道之全，修己治人之要，具在《論語》一書。《學》《庸》皆孔子之傳，而曾子、子思獨得其宗。明新止善，家國天下之所以齊治平也；性教中和，天地萬物之所以位育，九經達道之所以行也。至于孟子繼往聖而開來學，闢邪說以正人心，性善仁義之旨，著明於天下。此聖賢訓辭詔後，皆為萬世生民而作也。道統在是，治統亦在是矣。歷代賢哲之君，創業守成，莫不尊崇表章，講明斯道。朕紹祖宗丕基，孳孳求治，留心問學，命儒臣撰為《講義》，務使闡發義理，裨益政治，同諸經史進講，經歷寒暑，罔敢間輟。茲已告竣，思與海內臣民共臻至治，特命校刊，用垂永久。爰製序言，弁之簡首。每念厚風俗必先正人心，正人心必先明學術，誠因此編之大義，究先聖之微言，則以此為化民成俗之方，用期夫一道同風之治，庶幾進於唐虞三代文明之盛也夫。<sup>44)</sup>

在另外幾篇序中，康熙也從不同角度展開申論。康熙十九年(1680)四月，〈御製日講書經解義序〉謂：“天生民而立之君，非特予以崇高富貴之具而已，固將副教養之責……蓋治天下之法，見于虞夏商周之書，其詳且密如此，宜其克享天心而致時雍太和之效也。所以然者，蓋有心法以為治法之本焉。……朕萬幾餘暇，讀四代之書……夙夜兢兢，思體諸身心，措諸政治，以毋負上天立君之意，夫豈敢一日忘哉！”<sup>45)</sup>又康熙二十二年(1683)十二月，〈御製日講易經解義序〉：“朕惟帝王道法，載在《六經》……朕夙興夜寐，惟日孜孜，勤求治理，思古帝王立政之要，必本經學……朕惟體乾四德，以容保兆民，且期庶司百執事，矢于野渙羣之公，成拔茅允昇之美，則泰交媿於明良，而太和溢於宇宙，庶稱朕以經學為治法之意也夫！”<sup>46)</sup>

44) 本序載《御製日講四書解義》卷首(《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208冊，1-2頁)，又收入《聖祖實錄》卷七十(《清實錄》第4冊，899頁)。

45) 本序載《御製日講書經解義》卷首，《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4冊，1-2頁。

46) 本序載《御製日講易經解義》卷首(《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37冊，201-202頁)，又載于《聖祖實錄》卷一一三(《清實錄》第5冊，170-171頁)。

綜合以上諸序，可知康熙對儒家經典之體認，至少有以下幾個層次：

甲、四子之書(《四書》)亦傳承二帝三王之道，實“得《五經》之精意而為言”，因此與《五經》同為“載道之具”。

乙、“天生民而立之君”，故帝王與先師同源而殊塗，使命與職分俱出于天(“天生”)，惟分別“作君作師”而已。先師所傳之“道統”，與帝王分守之“治統”，亦屬同源，故曰“萬世道統之傳，即萬世治統之所繫”。

丙、《五經》《四書》既為先師載道之具，“為萬世生民而作”，那么，其中亦包蘊有治世之法，“帝王道法，載在《六經》”<sup>47)</sup>，即所謂“道統在是，治統亦在是矣”。

丁、帝王稟天命以治天下，必從經典中尋找道法、治法，即“古帝王立政之要，必本經學”。是以創業守成之君，研習經典自即應有之義，“闡發義理，裨益政治”，期能獲得“化民成俗之方”，達成“一道同風之治”，甚而進于儒家所盛稱之“唐虞三代文明之盛”。

總之，康熙不僅步武朱子，表彰《四書》，推為與《五經》相齊的“載道之具”，而且從上天“作君作師”，分司治統、道統這一邏輯起點出發，為帝王研習經典以羽翼治統找到了合理的根據。易言之，作為道統所繫的《五經》《四書》，在康熙手里，轉換成了治理天下的治統之具，從而為“以經學為治法”鋪平了道路，為現實政治提供服務。其高明之處在于，既泯滅了滿漢之別，又為帝王闡釋儒家經典找到了合理依據，從而為御定經解上昇為清王朝的官方新經典奠定了理論基礎。

康熙進行上述理論建構的學理根據，實本于朱子。試觀其〈大學章句序〉：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蓋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間，則天必命之以為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

47) 按：《六經》，蓋即《五經》加上《樂經》，後者無經文流傳下來。

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48)

不僅如此，康熙在接受漢文化、研習儒家經典的歷程中，貫窮了一條主綫，即將程朱理學視為朝廷方略，備加推服與尊崇。康熙自稱：

朕自冲齡至今，六十年來，未嘗少輟經書。唐虞三代以來，聖賢相傳授受，言性而已。宋儒始有性理之名，使人知盡性之學，不外循理也。故敦好典籍，於理道之言尤所加意。臨蒞日久，玩味愈深，體之身心，驗之政事，而確然知其不可易。49)

對朱子學說，尤為推崇，蓋因朱子“集大成而緒千百年絕傳之學，開愚蒙而立億萬世一定之規；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釋《大學》則有次第，由致知而平天下，自明德而止於至善，無不開發後人，而教來者也”；是以“朕讀其書，察其理，非此不能知天人相與之奧，非此不能治萬邦於衽席，非此不能仁心仁政施於天下，非此不能外內為一家。讀書五十載，只認得朱子一生所作何事”50)。所獲教益亦多：“持身務以誠敬為本，治天下務以寬仁為尚。此心此念，恪守五十年，夙夜無間。即纖悉細務，不敢稍有意忽。”51) 康熙還下令彙編《朱子全書》，纂修《性理精義》，重修《性理大全》。此舉與纂修御定經解，實後先輝映，相得益彰，為中央王朝的穩固統治提供了文獻與理論上的支撐。

康熙之動機，自然在收拾人心，穩固統治52)。他對朱子的服膺，全在於朱子“忠君愛國之誠，動靜語默之敬，文章言談之中，全是天地之正氣，宇宙之大道”53)。程朱理學對封建綱常秩序的維護，最有利于王朝的鞏固與統治。

48) 《四書章句集注》，朱熹撰，中華書局1983年版，1頁。

49) 康熙《御製性理精義序》，載《御纂性理精義》卷首，《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719冊，589頁。

50) 康熙《御製朱子全書序》，《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720冊，2頁。

51) 《聖祖實錄》卷二四五，康熙五十年三月庚寅條，《清實錄》第6冊，435頁。

52) 康熙五十七年(1718)四月癸未，藉太和殿策試之機，康熙表明了自己廣文教、講經術、推尊朱子的治國方略與學術旨趣。參《聖祖實錄》卷二七八，《清實錄》第6冊，728-729頁。

53) 《聖祖實錄》卷二四五，康熙五十年三月庚寅條，《清實錄》第6冊，435頁。

而是否有助于治政，正是康熙衡量經史書籍之標準：

自古經史書籍，所重發明心性，裨益政治。必精覽詳求，始成內聖外王之學。朕披閱載籍，研究義理，凡厥指歸，務期於正。諸子百家，汨濫詭奇，有乖經術。今搜訪藏書善本，惟以經學、史乘實有關係修齊治平、助成德化者，方為有用。其他異端說，概不准收錄。<sup>54)</sup>

與此相映照的，是對所謂“小說淫辭”的厲行嚴禁：

朕惟治天下，以人心風俗為本。欲正人心、厚風俗，必崇尚經學，而嚴絕非聖之書。此不易之理也。近見坊間多賣小說淫辭，荒唐俚鄙，殊非正理。不但誘惑愚民，即縉紳士子，未免遊目而蠱心焉。所關於風俗者非細，應即行嚴禁。<sup>55)</sup>

康熙不僅完成了對御定經解上昇為新經典的理論建構，也通過皇權的力量，不斷地向全國推廣諸書。康熙朝編就了《日講四書解義》二十六卷、《日講書經解義》十三卷、《日講易經解義》十八卷三部經解的編撰與刊印（有漢文、滿文兩種版本），另外纂成了《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三十八卷、《御製律呂正義》五卷、《御纂周易折中》二十二卷及《御纂朱子全書》六十六卷、《御纂性理精義》十二卷。“日講”系列尤為康熙所心血所繫。康熙十七年(1678)十二月辛巳，“頒《日講四書解義》于滿漢文武大臣”<sup>56)</sup>。康熙十九年十一月甲戌，“賜諸王、貝勒、貝子、公、內大臣、都統以下，阿思哈尼哈番以上，並滿大學士、學士、九卿、詹事、國子監祭酒等官，清文《日講書經解義》各一部”<sup>57)</sup>。康熙十九年十二月丁亥，“賜漢大學士、學士、九卿、詹事、國子監祭酒等官，漢文《日講書經解義》各一部”<sup>58)</sup>。康熙二十三年四月丁巳，翰林院掌院學士牛鈕等進呈刻成《日講易經解義》。康熙下旨：“《易經》闡發天人理數，道統攸關。朕朝夕披玩，期造精微。講幄諸臣，殫

54) 《聖祖實錄》卷一二六，康熙二十五年閏四月庚申條，《清實錄》第5冊，336頁。

55) 《聖祖實錄》卷二五八，康熙五十三年夏四月乙亥條，《清實錄》第6冊，551頁。

56) 《聖祖實錄》卷七十八，《清實錄》第4冊，999頁。

57) 《聖祖實錄》卷九十三，《清實錄》第4冊，1177頁。

58) 《聖祖實錄》卷九十三，《清實錄》第4冊，1178頁。

心剖析。深有裨於典學。著即頒行。”<sup>59)</sup>康熙二十四年，左副都御史胡昇猷疏請刊刻經筵講義，頒示中外，翰林院請康熙御製序文，得到允許<sup>60)</sup>。

康熙二十五年(1686)，為表示對程朱等宋儒之尊崇，下令禮部：“御書‘學達性天’四字匾額，頒發宋儒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邵雍、朱熹祠堂及白鹿洞書院。又以湖廣長沙府嶽麓書院，為宋儒張栻、朱熹講學之所，一體給匾，並頒《日講解義》經史諸書。”<sup>61)</sup>將“日講”系列經解頒岳麓書院，更具教化天下的象徵意義。頒書範圍，也由朝中大臣而擴及天下書院，體現出由官僚系統而擴及教育系統的推廣態勢。

## 2. 雍正對御定經解的續纂與推廣

雍正對康熙功業，備加推崇。即位之初，即效法乃父故事，下詔舉行經筵日講，稱其父“紹精一執中之統，勵敬天勤民之心。文謨武烈，經緯萬幾。盛德日新，大業鴻顯。……皇考聖祖仁皇帝，謙德彌光，聖不自聖”<sup>62)</sup>。以乃父為聖人，甚至定廟號為“聖祖”，正是紹承康熙“君師”出于天授的理論，為御定經解上昇為新經典張目。

康熙朝開始編纂的《欽定詩經傳說彙纂》二十一卷、《欽定書經傳說彙纂》二十四卷兩種集解性質的經解，至雍正朝始竟其業。《日講春秋解義》一書，創始於康熙，由雍正下旨編成，刊成於乾隆<sup>63)</sup>。雍正五年(1727)，〈御製詩經傳說彙纂序〉稱康熙“右文稽古，表章聖經”，御定《周易》《春秋》《詩經》經解，“皆以朱子之說為宗”；本書之纂，“期以闡先王垂教之意與孔

59) 《聖祖實錄》卷一一五，〈清實錄〉第5冊，193頁。

60) 《聖祖實錄》卷一二〇，康熙二十四年四月丁酉條，〈清實錄〉第5冊，264頁。

61) 《聖祖實錄》卷一二八，康熙二十五年十一月丙申條，〈清實錄〉第5冊，370-371頁。

62) 《世宗實錄》卷六，鄂爾泰、張廷玉等纂修，雍正元年四月乙丑條，〈清實錄〉第7冊，131-132頁。

63) 參乾隆〈御製日講春秋解義序〉(乾隆二年仲春)，載《日講春秋解義》卷首，〈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72冊，3頁。

子刪詩之旨，學於是者，有得於興觀羣怨之微，而深明於事父事君之道，從政專對，無所不能，則經學之實用著，而所謂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化天下者，亦於是乎行焉”<sup>64</sup>)。對康熙傳承朱子之說、求經學之實用，心領神會。雍正八年，〈御製書經傳說彙纂序〉有更進一步的申發：

朕思六經皆治世之書，而帝王之大經大法，昭垂萬古者，惟《尚書》為最備。蓋自繼天立極，精一執中，二帝三王之心法，遞相授受，而治法亦因之以傳。……我皇考聖祖仁皇帝，聖學淵深，治功弘遠，存於中者，二帝三王之心；發於外者，二帝三王之治。而稽古好學，於典謨訓誥之篇，沈潛研究，融會貫通。……夫後世之天下，唐虞三代之天下也，而治法之垂為典章，心法之原於性命者，先後同揆，百世之聖君賢輔，未能易也。……朕夙夜兢兢，冀克守主敬存誠之道，以遂觀光揚烈之懷。尤冀卿尹百執事，共體元首股肱之誼，殫協恭勳翼之忱，寅亮天工，誠和民志。俾薄海内外，永底乂安，於以遠宗聖哲，而仰承皇考尊崇經學，啟牖萬世之盛心，顧不美歟!<sup>65</sup>)

雍正是序，以《尚書》備帝王之大經大法，而康熙集帝王與聖人為一身，故能融會貫通，深得二帝三王之心法與治法。雍正實紹述乃父之理論建構而加以發揮，且其作為傳人之志意亦躍然紙上。

科舉是古代中國選拔人才的重要制度，也是讀書人晉身之階。科舉命題範圍的確定，實有引領天下學風的導向作用。雍正即利用科舉這一途徑，擴大了康熙御定經解的影響力。即位之初，即于各省學政科考生員時，增用經題文一篇<sup>66</sup>)；復于雍正四年，允許各省五經取中副榜之人，準作舉人參加會試，以彰顯“士子讀書制行之道，首在明經”<sup>67</sup>)。雍正九年，直接採用《日講四書解義》作為出題範圍，以取滿、蒙生員、舉人、進士<sup>68</sup>)。經雍正之手，

64) 雍正〈御製詩經傳說彙纂序〉(雍正五年春三月朔)，載《欽定詩經傳說彙纂》卷首，《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3冊，1-2頁。

65) 載《欽定書經傳說彙纂》卷首(雍正八年仲春十二日序)，《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5冊，396-397頁。

66) 《世宗實錄》卷十四，雍正元年十二月庚戌條，《清實錄》第7冊，246頁。

67) 《世宗實錄》卷四十九，雍正四年十月甲戌條，《清實錄》第7冊，744頁。

68) 《世宗實錄》卷一〇五，雍正九年四月壬戌條，《清實錄》第8冊，395頁。

御定經解影響開始擴展至國家選才系統，進一步強化了欽定經典的功能。

### 3. 新經典的確立：乾隆對御定經解的尊崇與推廣

清初御定經解的新經典地位，確立于乾隆朝。乾隆即位之初，不待改元，即任命日講起居注官<sup>69</sup>，表明對其祖、父經筵日講制度的高度認同。復採取以下幾個方面的措施，使御定經解的新經典地位得以確立：

#### (1) 紹承前緒，補、續御定經解之編纂，使成完璧。

首先，康熙朝“日講”系列經解中，《日講禮記解義》六十四卷、《日講春秋解義》六十四卷(另有《總說》一卷)兩部經解，未卒其業，至乾隆朝始完成之。為編《日講禮記解義》，乾隆專門拔擢人才充任編校<sup>70</sup>。其次，康熙朝“彙纂”系列經解中，尚無禮類。乾隆即位之始，即命儒臣纂修《三禮義疏》，以足成康熙“彙纂”經解系列，“俾與《易》《書》《詩》《春秋》四經，並垂永久”<sup>71</sup>。

#### (2) 褒崇揄揚，視御定經解成爲聖人傳心之作。

乾隆二年(1737)二月，乾隆撰《日講春秋解義序》，強調康熙、雍正以帝王之尊，能解聖人之大義，抉其根源；開通《春秋》之窾突，善繼善述：

蓋是經乃孔子所手定也，辭約而義深。……我聖祖仁皇帝，聰明天亶，自少時即篤好經書，及躬攬大政，辨色出視朝，裁決萬幾甫畢，即召儒臣講論經義，務抉其根源，叅伍羣言，以求至當。……夫《解義》之成，蓋數十年於茲矣。觀皇祖之久不宣布，可以徵望道未見之心；觀皇考之再三考訂，而後

69) 《高宗實錄》卷七，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己未條，慶桂、德瑛等纂修，《清實錄》第9冊，187頁。按：乾隆朝正式舉行進筵在乾隆三年，即服喪期滿之後。參下文。

70) 《高宗實錄》卷三十五，乾隆二年正月丙辰條，《清實錄》第9冊，658頁。

71) 《高宗實錄》卷二十一，乾隆元年六月己卯條，諭總理事務王大臣文。載《清實錄》第9冊，501頁。

命刊，可以知善繼善述之義。豈惟是經之窈突，將由是以開通哉！即兩朝聖人之心法、治法，亦於斯可睹矣。<sup>72)</sup>

次年正月，乾隆下令舉行經筵，諭禮部曰：

朕惟四子六經，乃群聖傳心之要典，帝王馭世之鴻模。君天下者，將欲以優入聖域，茂登上理，舍是無由。我皇祖聖祖仁皇帝、皇考世宗憲皇帝，時禦講筵，精研至道，聖德光被，比隆唐虞。朕夙承庭訓，典學維殷，御極以來，勤思治要。已命翰林科道諸臣，繕進經史，格言正論，無日不陳於前。特以亮陰之中，經筵未御。茲既即吉，亟宜舉行。<sup>73)</sup>

乾隆視康熙、雍正為兩朝聖人，直與孔子並列，是以能“紹前聖之心法，集先儒之大成”(參下引)。如此，則經其“繼”“述”之經解，自然具有合法的權威性，成為新的經典文本。

(3) 推廣流布，使御定經解成天下士子必讀之書。

乾隆推廣御定經解的途徑有二。一是商業途徑，即聽任民間刷印。乾隆元年四月辛卯，諭總理事務王大臣：“朕思諸書，實皇祖惠教萬世、皇考頒行天下之典籍，安可不廣為敷布？著直省撫藩諸臣，加意招募坊賈人等，聽其刷印，通行鬻賣，嚴禁胥吏阻撓需索之弊。但使坊賈皆樂於刷印，斯士子皆易於購買，庶幾家傳戶誦，足以大廣厥傳。”<sup>74)</sup>

二是教育途徑，即指定學政課士。乾隆又諭：“朕又思聖祖仁皇帝四經之纂，實綜自漢迄明二千餘年群儒之說而折其中，視前明《大全》之編僅輯宋元講解、未免庸雜者，相去懸殊。各省學臣，職在勸課實學，則莫要於宣揚聖教，以立士子之根柢。每科歲案臨時，豫飭各該學，確訪生童中有誦讀御纂諸經者，或專一經，或兼他經，著開名冊報。俟考試文藝之後，該學政就四經中斟酌舊說有所別異處，摘取數條，另期發問。只令依義條答，不必責以文采。有能答不失指者，所試文稍平順，童生即予入泮，生員即予補廩，

72) 乾隆〈御製日講春秋解義序〉，2-3頁。

73) 《高宗實錄》卷六十，乾隆三年正月癸亥條，《清實錄》第10冊，3-4頁。

74) 《高宗實錄》卷十七，《清實錄》第9冊，448頁。

以示鼓勵。務宜實力奉行，以副朕尊經育才之意。”<sup>75)</sup>

乾隆即位後，即致力於倡導“黜浮華而崇實學”的學術風氣，御定經解則成爲其心目中之完美規範，因此在乾隆三年再次飭命推廣：

士人以品行爲先，學問以經義爲重。故士之自立也，先道德而後文章；國家之取士也，黜浮華而崇實學。……至於學問，必有根柢，方爲實學。……至於書藝之外，當令究心經學，以爲明道經世之本。……我皇祖御纂經書多種，紹前聖之心法，集先儒之大成，已命各省布政司敬謹刊刻，聽人印刷，並准坊間翻刻廣行。恐地方大吏，不能盡心經理，則士子購覓，仍屬艱難，不獲誦讀。著督撫藩司等，善爲籌畫，將士子應讀之書，多爲印發，以爲國家造士育才之助。<sup>76)</sup>

綜上，乾隆通過續、補，使康熙朝“日講”與“彙纂”兩大系列的御定經解成爲完璧，又通過理論演繹，將其提昇爲聖人紹述之作，然後通過各種途徑加以推廣。至此，清王朝的新經典終於建構完成。聖賢大義變作帝王家學，御定經解成爲權威文本，乾隆以政治威權作後盾，賦予這批經解全新的歷史地位與使命。御定經解不僅壟斷了儒家核心經典的義理解釋，而且成爲士子必讀之書，變成集學術、政治、教育等功能於一體的大一統中央王朝的新經典。

## V. 清初御定經解之學術影響

在古代中國，某種權威一旦樹立，伴隨而來的必是某種程度上思想的禁錮與學術的沉悶。漢武時儒術獨尊，其他諸子自此黯淡；唐初《正義》一出，而自漢以來“篤實謹嚴”<sup>77)</sup>之治經風尙難再；明代《大全》懸爲令甲，王

75) 《高宗實錄》卷十七，《清實錄》第9冊，448-449頁。

76) 《高宗實錄》卷七十九，乾隆三年十月辛丑條，《清實錄》第9冊，243-244頁。

77) 《四庫全書總目·經部總敘》論及漢代經學風氣：“其初專門授受，遞稟師承，非惟話訓相傳，莫敢同異，即篇章字句，亦恪守所聞，其學篤實謹嚴，及其弊也拘。”《四庫全書總目》卷一，永瑤等纂，中華書局1965年版，1頁。

學末流遂至于狂禪。清初御定經解，經康熙、雍正、乾隆三代之努力，逐漸被樹立為清王朝的新經典，也自然產生了深遠的學術影響。

#### 1. 四庫館臣對御定經解新經典地位的認同

乾隆時開館纂修《四庫全書》，充任館臣的是當時最為優秀的一批學者，如戴震、翁方綱、姚鼐、邵晉涵、余集、紀昀等，堪稱乾嘉學術的中堅力量。按修書流程，每書最後均經乾隆過目。奏上之前，館臣必撰寫提要一篇(通常末署“總纂官紀昀、陸錫熊、孫士毅，總校官陸費墀”等銜名)，介紹該著之學術源流與價值。這批提要，通常被稱作“書前提要”，是後來《四庫全書總目》的主要部分，但是未經潤色或誇飾，最能見出四庫館臣對所選書籍的學術評價，易言之，實能代表當時主流學術群體對相關學術著作之共同見解。因此，館臣對御定經解的評價，為我們認識當時的學人風尚提供了一個較好的觀察角度。茲摘錄部分提要之評論文字，勒成下表(採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御定經解	書前提要摘錄
《日講易經解義》十八卷	我聖祖仁皇帝服膺朱子之書，而悅心研慮，訂為斯編。仍詔講幄諸臣，日以進講，蓋心契三聖之微言，以闡造化之功。用序所云“以經學為治法”者，崇德廣業，咸基於此矣。
《御纂周易折中》二十二卷	我聖祖仁皇帝道契義文，心符周孔，幾餘典學，深見彌綸天地之源，詔大學士李光地，採摭羣言，恭呈乙覽，以定著是編。冠以圖說，殿以啟蒙……蓋數百年分朋立異之見，至是而盡融；數千年畫卦繫詞之旨，乃至是而大彰矣。
《日講書經解義》十三卷	仰惟我聖祖仁皇帝，契精一之傳，敷蕩平之極，於二帝三王之道，集其大成，猶命儒臣，排日進講。凡精微之奧，諸臣所不能盡窺者，天語諄詳，親為闡釋，日積歲粹，以成此書。其於漢唐以後諸儒之說，掇其菁華，亦若涓塵之益海岳焉，洵乎君師統一，萬古為昭矣。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二十四卷	《書經傳說彙纂》二十一卷，聖祖仁皇帝御定……是編彙萃衆說，略短取長，大要雖衷蔡《傳》，而於制度名物、道里山川，益加詳審，是萬古治世之大法，實備於此，固不僅爲說經標準已也。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二十卷	是編之作，恭逢聖祖仁皇帝天寶聰明，道光經籍，研思六義，綜貫四家，於衆說之異同，既別白瑕瑜，獨操衡鑑；而編校諸臣，亦克承訓示，考證詳明，一字一句，務深溯詩人之本旨。故雖以《集傳》爲綱，而古義之不可磨滅者，必一一附錄，以補缺遺，於學術持其至平，於經義乃協其至當，風雅運昌，千載一遇，豈前代官書任儒臣拘守門戶者，所可比擬萬一乎！
《日講禮記解義》六十四卷	是書爲聖祖仁皇帝經筵所講，皆經御定，而未及編次成帙。皇上御極之初，乃命取繕書房舊稿，校刊頒行。禮爲治世之大經，《周禮》具其政典，《儀禮》陳其節文，《禮記》一書，朱子以爲《儀禮》之傳。……是編推繹經文，發揮暢達，而大旨歸於謹小慎微、皇自敬德，以納民於軌物。衛湜所集一百四十四家之說，鎔鑄剪裁，一一薈其精要，信乎聖人制作之意，惟聖人能知之矣。
《日講春秋解義》六十四卷	是編因宋儒進御舊體，以闡發微言，每條先列左氏之事迹，而不取其浮夸；次明《公》《穀》之義例，而不取其穿鑿。反覆演繹大旨，歸本於王道，允足明聖經之書法，而探帝學之本原。聖祖仁皇帝、世宗憲皇帝，聖聖相承，鄭重分明，以成此一編，豈非以經世之樞要，具在斯乎？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三十八卷	欽惟聖祖仁皇帝道契天經，心符聖義，於尼山筆削，洞鑿精微，雖俯念士子久誦胡《傳》，難以驟更，仍綴於三《傳》之末，而指授儒臣，詳爲考證。凡其中有乖經義者，一一駁正，多所刊除。至於先儒舊說，世以不合胡《傳》擯棄弗習者，亦一一採錄表章，闡明古學。蓋以聖人之德，居天子之位，故能蕩除門戶，辨別是非，挽數百年積重之勢，而反之於正也。……臣等繕校之餘，爲《春秋》幸，尤爲天下萬世讀《春秋》者幸也。
《日講四書解義》二十六卷	自朱子定著《四書》，由元明以至國朝，懸爲程試之令甲，家絃戶誦……我聖祖仁皇帝初年訪落，卽以經筵講義，親定是編。所推演者，皆作聖之基，爲治之本。詞近而旨遠，語約而道宏。聖德神功所爲，契洙泗之傳，而繼唐虞之軌者，蓋胥肇於此矣。

細繹上述評論，可知四庫館臣對康熙、雍正、乾隆三帝之理論建構全盤接受：《五經》《四書》，爲帝王治世之具，聖賢傳道之書；本朝諸帝以帝

王而兼聖人(所謂“以聖人之德，居天子之位”，“聖人制作之意，惟聖人能知之”，且“聖聖相承”)，推服朱子之學(如稱“服膺朱子之書”)，洞悉聖賢立言之旨(如稱“所推演者，皆作聖之基，為治之本”)，紹承堯舜相傳之道(如稱“道契義文，心符周孔”，“契洙泗之傳，而繼唐虞之軌”，“足明聖經之書法，而探帝學之本原”)，達到“君師統一，萬古為昭”。四庫館臣完全把御定經解當作本朝之新經典而大力鼓吹。

古代中國學術發展的脈絡與進程，通常為政治所左右。四庫館臣對御定經解的認同與推崇，正體現了在政治強權推行下的新經典的鉅大影響力。另一方面，在清王朝將御定經解新經典化的歷程中，除帝王提倡之外，還必須得到廣大知識階層的認同、接納與推廣。四庫館臣既入朝廷彀中，豈敢與乾隆立異？作為當時最為傑出的學術群體，館臣對御定經解的大力鼓吹，恰從學術上，與乾隆所代表的政治威權形成合力，進一步確立了御定經解的新經典地位。

## 2. 御定經解之學術影響

清初御定經解被樹立為王朝新經典，其直接影響有二。

(1) 阻滯了程朱理學的進一步發展。程朱理學雖被樹立為清王朝官方意識形態，但並沒有得到進一步的拓展，有學者甚至感慨，哲學遺風至清初竟然“消歇”<sup>78</sup>。蓋清王朝雖然推尊程朱理學，以《四書》《五經》課士，但都是出于維護其統治的需要。清廷表彰湯斌、張伯行這些服膺程朱的理學名臣，看重的是其理亂解紛的治世能力與忠貞不貳的個人品節，而不是其釋解程朱的理論水平。康熙天姿聰穎，勤奮好學，通過經筵日講，完成了對儒家經典的啟蒙與會通，復旁通西學，博學多能，其學術識見反在一般理學名臣之上。學成之後的康熙，對一干理學諸臣之學識、品行，頗有腹誹。在康熙

78) 余英時〈清代思想史的一個新解釋〉，載其《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江蘇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200頁。

三十三年閏五月給大學士的上諭中，康熙指出，熊賜瓚學識不廣，魏象樞見解迂腐、挾仇懷恨；復云：

又李光地、湯斌、熊賜履，皆講道學之人，然而各不相合。李光地，曾授德格勒《易經》。李光地請假回籍時，朕召德格勒進內講《易》。德格勒奏言：“李光地熟精兵務，其意欲為將軍提督。皇上若將李光地授一武職，必能勝任。”反覆為李光地奏請。爾時朕即疑之。德格勒又奏：“熊賜瓚所學甚劣，非可用之人。”朕欲辨其真偽，將德格勒、熊賜瓚等考試。湯斌見德格勒所作之文，不禁大笑，手持文章墮地。向朕奏云：“德格勒文甚不堪，臣一時不能忍笑，以致失儀。”既而湯斌出，又向眾言：“我自有生以來，未曾有似此一番造謊者，頃乃不得已而笑也。”使果係道學之人，惟當以忠誠為本。豈有在人主之前，作一等語，退後又別作一等語者乎？今湯斌雖故，李光地、德格勒現在也。又熊賜履所著《道統》一書，王鴻緒奏請刊刻頒行學宮，高士奇亦為作序，乞將此書刊佈。朕覽此書內，過當處甚多。凡書果好，雖不刻，自然流布，否則，雖刻何益？道學之人，又如此務虛名，而事干瀆乎？今將此等處，不過諭爾等聞知。朕惟以治天下國家之道存之於心，此等人議論，又何足較也。<sup>79)</sup>

李光地、湯斌、熊賜履、德格勒、王鴻緒、高士奇等人，各携其私，黨同伐異，忠誠之本既棄不守，議論之語焉足取信？明講道學，實與道學相去甚遠，宜其為康熙所輕。此時康熙所衷心推服者，恐惟五百年前之朱子一人而已。熊賜履既著有《學統》，又著有《道統》；由前者內容類比可知，《道統》所敘，正為理學源流。康熙既以為“過當”，聽其“自然流布”，乾隆時修《四庫全書》，即不予收錄。理學名臣之理學著作而不容于以推尊程朱理學相尚的清廷，正與最高統治者對理學名臣之實際期許密切相關。

御定經解上昇為王朝經典，對程朱理學作進一步演繹的空間即大為壓縮，從而阻礙了程朱理學的進一步發展。于是，一方面高調地推尊程朱理學，另一方面卻又阻礙了程朱理學的發展：這一看似矛盾實則合理的現象，

79) 《聖祖實錄》卷一六三，康熙三十三年閏五月癸酉諭大學士之語。《清實錄》第5冊，785頁。

就在御定經解被經典化的過程中出現了。

乾隆即位後，“勤思治理，廣開言路，俾大小臣工，皆得密封摺奏”，“凡言有裨益，立見施行”<sup>80</sup>。但是，謝濟世、李徽之上奏，卻引起乾隆痛責與譏罵：

邇來諸臣所奏……其中尤可詫怪者，謝濟世請用其自注《學》《庸》易朱子《章句》，頒行天下。獨不自揣己與朱子分量，相隔如雲泥，而肆口詆毀，狂悖已極！且謂明代以同鄉同姓，尊崇朱子之書，則直如爨下老婢，陳說古事，雖鄉里小兒，亦將聞而失笑也。李徽欲以《孝經》與《四書》並列為五，立義支離，屬辭鄙淺，于宋元大儒所論《孝經》源流離合，曾未寓目，即欲變亂歷代論定、列於學官、數百年不易之舊章，亦不自量之甚矣。……夫此數人者，皆輿論所推服為讀書人而久不見用者也。今朕拔而用之，而數人之識見若此，陳奏若此，豈不有愧于士林之清議，與朕特擢之恩乎？<sup>81</sup>

謝濟世、李徽積極應詔陳策，或欲用其自注《學》《庸》以易朱子《章句》，或欲昇《孝經》與《四書》並列，試圖改變現有之經典現狀，均未正確揣測上意。其建議在乾隆看來，顯然對康、雍、乾主持的經學闡釋權構成了嚴重挑戰。新經典既已樹立，意味着以義理解經的路徑已為新經典所壟斷，其他人等，非帝非聖，焉容僭越？謝、李應命上奏而被斥，惟有置諸清廷樹立新經典的背景下，才可以得到合理之解釋。此事堪稱乾隆尊崇程朱、維護御定經解義理解釋權之顯例。

(2) 迫使學者選擇以訓詁考據為主的治學方向。以義理解經的治學路徑既被御定經解所壟斷，學者惟有競趨于訓詁考據一途。這是乾嘉考據學得以獨盛的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四庫館臣作為當時最優秀的學術群體，同時也是考據學的大本營。茲以戴震為例。作為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學者，戴氏著述等身，當時即享有令名。但其名著《孟子字義疏證》，卻是一部講求義理之

80) 《高宗實錄》卷十三，乾隆元年二月庚辰條，《清實錄》第9冊，375頁。

81) 《高宗實錄》卷十三，乾隆元年二月庚辰條，《清實錄》第9冊，375-376頁。

學的著作<sup>82)</sup>。在御定經解懸為經典的壓力下，戴震為其書採用了一個純粹具有訓詁、考據學意味的書名。他的學術宣言：“經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詞也，所以成詞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詞，由詞以通其道，必有漸。”<sup>83)</sup>雖欲達到“明道”這一義理之學的目的，卻仍然採用了從訓詁入手的策略，不能不說受到了御定經解所代表的政治威壓的影響。

相較義理之學，清代考據之學獨盛，尤以乾嘉為盛，這是不爭的事實。造成這一局面的原因，學界提出各種解說。如梁啟超提出“理學反動”說，余英時提出“內在理路”說，王俊義、黃愛平等提出“康乾盛世為主”說。近來，姜廣輝等在批評上述諸說之後，提出要從內外兩個方面找原因進行分析。內因是“儒家文化積累所產生的知識條理性與真確性的需要”，外因是“清廷統方略的鐵腕主導”<sup>84)</sup>。諸家各執一說，各得一端<sup>85)</sup>，均未充分認識到義理之學(程朱理學)本身在清初發展的際遇問題。御定經解被標舉為新經典，懸為令甲，則義理之學本身有被皇權壟斷的趨勢，至少從表面上陷入停滯狀態。康熙盛世所提供的物質條件，又為學術的發展提供了極佳的際遇。考據之學遂因勢而盛，蔚成大國。

晚清咸同之際，太平天國起而反對清廷，兵燹所至，經籍蕩然。有識之士，欲起而刊印經籍，振興封建文教。其策略，仍欲倣效清初推廣御定經解之故事。江蘇學政鮑源深之上疏(同治六年(1867)五月前)，堪稱代表：

臣伏查學政全書，各省府州縣學，向有尊藏御纂、欽定諸書，並於雍

82) 按：該書分三卷，上卷談理，中卷談天道，下道談性，故今人目為戴氏“最重要的哲學著作”(《孟子字義疏證·點校說明》，何文光整理本，中華書局1981年版，1頁)。

83) 《東原文集》卷九〈與是仲明論學書〉，《戴震全書》第六冊，戴震著，張岱年主編，黃山書社1995年版，370頁。

84) 以上參《中國經學史》第四卷第八十九章《乾嘉考據學形成的歷史原因》，姜廣輝主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版，250-262頁。所謂“統治方略的鐵腕主導”，是指文字獄等高壓政策以及開三禮館、明史館、博學鴻儒科等籠絡政策。

85) 例如余英時先生即承認：“我雖然批評了以上各種解釋，但我自己提出的‘內在理路’的新解釋，並不能代替外緣論，而是對他們的一種補充，一種修正罷了。”〈清代思想史的一個新解釋〉，載其《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227頁。

正、乾隆初年，迭經奏准，令直省撫藩將頒發御纂、欽定經史諸書，敬謹重刊，並聽坊間印售，以廣流傳；又議准督撫將十三經、廿一史諸書購買，頒發各學收管，令士子講習等因在案，仰見列聖右文稽古，嘉惠士林至意。近年各省因經兵燹，書多散佚。臣視學江蘇，按試所經，留心訪察，如江、蘇、松、常、鎮、揚諸府，向稱人文極盛之地，學校中舊藏書籍，蕩然無存，藩署舊有恭刊欽定經史諸書，版片亦均毀失。民間藏書之家，卷帙悉成灰燼。亂後雖偶有書肆所刻經書，俱係刪節之本，簡陋不堪。士子有志讀書，無從購覓。蘇省如此，皖浙江右諸省，情形諒亦相同。以東南文明大省，士竟無書可讀，其何以興學校而育人才？……竊維士子讀書以窮經為本，經義以欽定為宗。臣伏讀世祖章皇帝御註《孝經》、聖祖仁皇帝御纂《周易折中》、欽定《書》《詩》《春秋》三經《傳說彙纂》，世宗憲皇帝御纂《孝經集註》、高宗純皇帝御纂《周易述義》《詩義折中》《春秋直解》、欽定《三禮義疏》，皆闡發精微，權衡至當，足使窮經之士，不淆於衆說，得所指歸。以上各書，請旨敕下各撫藩，先行敬謹重刊，頒發各學，並遵舊例，聽書估印售，以廣流傳，庶使僻壤窮鄉，皆知研求經學。<sup>86)</sup>

“士子讀書以窮經為本，經義以欽定為宗”，這一理念，足證御定經解一旦懸為經典，流布全國，即具有統一思想、作育人才之教化功能，甚至到了近代，中興諸臣仍抱持不放，視為良方。晚清官書局因此大規模興辦，成為近代文獻傳承的主體，即是諸臣踐行該理念的結果<sup>87)</sup>。

綜上考論，可知清初諸帝，為與大一統的中央集權政治相適應，採取全面接受漢文化、尊崇程朱理學的文化策略。通過經筵日講活動，諸帝完成了對儒家經典的啟蒙。康熙雄才大略，博學多能，尤能會通儒家思想，下令編纂了系列御定經解及部分理學著作。為進一步巩固思想統治，康熙從天賦道

86) 鮑源深《請購刊經史疏》，載《同治中興京外奏議約編》卷五，陳弼編，上海書店1984年影印清光緒刻本。

87) 詳參張宗友《晚清官書局與近代文獻傳承》，載《中國語文學》第60輯(2012.8)，163-204頁。

統、君權出發，賦予御定經解作為本朝新經典的功能，頒賜群臣及書院。雍正、乾隆遵循並強化了這一理論建構，視前任君主為聖人，完成了御定經解的纂修工程，並漸次擴廣至天下，成為士人必讀之書。四庫館臣對御定經解的認同與推崇，復從學術的角度鞏固了新經典地位，也體現了在政治強權推行下的新經典的鉅大影響力。新經典的確立，使清廷有壟斷對經典的義理解釋權的趨勢，一方面阻礙了程朱理學的進一步發展，另一方面又迫使儒家學者選擇訓詁考據的治學之路，從而深刻地影響了乾隆以降的思想與學術面貌，決定了傳世經典文獻的傳承路徑。

### <參考文獻>

- 巴泰、圖海等纂修，《世祖實錄》，載《清實錄》第3冊，中華書局，1985。
- 馬齊、張廷玉等纂修，《聖祖實錄》，載《清實錄》第4-6冊，中華書局，1985。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整理，《康熙起居注》，中華書局，1984。
- 鄂爾泰、張廷玉等纂修，《世宗實錄》，載《清實錄》第7-8冊，中華書局，1985。
- 慶桂、德瑛等纂修，《高宗實錄》，載《清實錄》第9-10冊，中華書局，1985。
- 順治御定，蔣赫德等纂，《御定孝經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永瑤、紀昀等纂修，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第182冊。
- 順治御定，傅以漸、曹本榮等纂，《易經通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37冊。
- 康熙御定，喇沙里、陳廷敬等纂，《御製日講四書解義》，《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208冊。
- 康熙御定，庫勒納、葉方藹等纂，《御製日講書經解義》，《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4冊。

- 康熙御定, 牛鈕、孫大豐等纂, 《御製日講易經解義》, 《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37冊。
- 康熙御定, 張玉書、陳廷敬等纂, 《御定康熙字典》, 《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229冊。
- 康熙御定, 李光地、熊賜履等纂, 《御纂朱子全書》, 《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720冊。
- 康熙御定, 李光地等纂, 《御纂性理精義》, 《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719冊。
- 康熙御定, 王項齡等纂,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 《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第83冊。
- 康熙御定, 王項齡等纂,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 《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5冊。
- 康熙御定, 允禮、張廷玉、方苞等纂, 《日講春秋解義》, 《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72冊。
- 鮑源深, <請購刊經史疏>, 載《同治中興京外奏議約編》卷五, 陳弢編, 上海書店, 1984年影印清光緒刻本。
- 朱熹著, 《四書章句集注》, 中華書局, 1983。
- 乾隆敕撰, 永瑤等纂, 《四庫全書總目》, 中華書局, 1965。
- 戴震著, 《孟子字義疏證》, 何文光整理本, 中華書局, 1981。
- 陳東著, 《清代經筵制度研究》, 山東大學, 2006年度博士論文。
- 余英時著, 《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 江蘇人民出版社, 1989。
- 戴震著, 張岱年主編, 《戴震全書》第六冊, 黃山書社, 1995。
- 姜廣輝主編, 《中國經學史》,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10。
- 張宗友, <晚清官書局與近代文獻傳承>, 載《中國語文學》第60輯(2012.8)

## &lt;國文提要&gt;

清 나라 초 順治, 康熙, 雍正 황제는 통일된 중앙집권정치와 상응하기 위해 전면적으로 漢문화를 받아들이고, 程朱의 理學을 숭상하는 문화 정책을 채택했다. 經筵을 매일 실시해 제왕들은 유교 경전의 이해를 높였다. 康熙帝는 재능과 전략, 박학과 능력을 지녀 유가사상에 능통할 수 있었고, 매일의 강연 내용을 책으로 편찬하도록 하명했다.《日講易經講義》와 “彙纂”(如《欽定春秋傳說彙纂》) 등 두 계열의 어전 경전 해석 그리고 부분 理學 저서, 예를 들면 《御纂朱子全書》 등이 그것이다. 康熙는 道統과 君權으로 어전에서 정한 경전 해석을 왕조의 새로운 경전 해석으로 삼고, 여러 신하들과 서원에 배포했다. 雍正, 乾隆은 이를 계승해 이론을 강화하고, 전임 군주를 성인으로 삼고, 어전 경전 해석 찬수 프로젝트를 완성하며, 아울러 점차 세상에 확대해 선비들의 필독서로 만들었다. 四庫館의 신하가 어전 경전 해석에 대해 동의하고 추앙하자 다시 학계에서 新經典의 지위를 공고히 했으며, 정치적 강권으로 추진해 新經典은 막강한 영향력을 지니게 됐다. 新經典의 확립은 청 조정이 경전의 의리에 대한 해석권을 전유한 것으로 程朱理學의 진일보한 발전을 저해했고, 유가 학자들로 하여금 훈고 고증학의 학문 방식만을 선택케 했다. 그로 인해 乾隆이래의 사상과 학술 면모에 깊은 영향을 주었으며 경전 문헌 전승 방식을 결정했다.

주제어 : 御定經解, 新經典, 康熙, 雍正, 乾隆